专题：聚焦日本与中日关系

令人担忧的安倍晋三政权

王新生

内容提要：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首相后大力实施“安倍经济学”，在此基础上出现股市上涨、日元贬值、经济恢复增长的局面，自民党因此获得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但安倍首相的最大目标是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即修改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增强军事实力等，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国家”乃至军事大国化，并为此竭力渲染“中国威胁论”。尽管如此，日本经济能否顺利恢复增长、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下的国内市场萎缩、发展军事实力尚缺乏民意支持以及美国因素的影响，均对其目标的实现投下阴影。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　修改宪法　集体自卫权　军事大国化

由于“安倍经济学”的短期效应，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上升，且取得2013年参议院选举的胜利。但由于强行通过《秘密保护法》，安倍政权也导致民众的抗议，甚至美国也对其参拜靖国神社表示“失望”。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与政治领域的新国家主义改革之间的相互矛盾增加了改革的难度，老龄化、少子化人口结构拖累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发展，特别是其新民族主义外交政策阻碍了与近邻国家经贸合作的进一步顺利发展，也许“积极和平主义”式的新型穷兵黩武政策成为安倍政权重振日本的主要策略？

一、搞活经济，稳定政权

自从1992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发展一直处在低迷状态，甚至有

王新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失去的10年”、“失去的20年”之说，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等将其称为以高债务、低成长、低利率与定量宽松为特征的“日本病”。实际上，日本经济并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1991至2009年，日本GDP年均增长约0.8%，用“停滞”一词描述其状况可能比较恰当。准确地讲，最为重要的“日本病”是社会问题，即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相对实力下降以及不容乐观的未来态势让日本人失去自信，社会严重缺乏应有的张力，积极向上的精神荡然无存，整个国家也处在方向迷失之中。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一代，由于过去2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劳动市场发生巨变，“非正式雇佣”的比例大幅度提升到36%，导致没有稳定职业的年轻人不仅收入较低，而且在沟通能力、生活技能、工作欲望、学习动力、消费意愿等方面急速下降，年轻女性每四位中就有一位选择永久单身，40%女性没有生儿育女的意愿。与此同时，日本出现了大量消极对待工作及恋爱甚至连性爱都觉得麻烦的“食草男”、长期没有女朋友或根本就没有过女朋友的“绝食男”、单纯喜欢自己一个人的“佛系男”，以及年过五旬也不结婚的中老年男女“家族难民”等。

即使如此，具有更大抱负的安倍首相清楚地知道，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具有长期政权的基础，而长期政权的关键是赢得2013年夏的参议院选举，赢得选举的前提条件则是满足选民刺激经济恢复增长的迫切需求。因此，在2012年9月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安倍在自己比较得意的“外交、安保、宪法”政策领域暂时偃旗息鼓，而是打出“重振经济”、“摆脱通缩”、“纠正日元币值过高”等旗号，重视缓和金融、增长战略等，这一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经济政策主张吸引了众多选民的目光。自民党获得大选胜利后于2012年12月26日成立的第二次安倍政权明确表示，新内阁是“危机突破内阁”，接着在2013年元旦安倍发表新年感言时又指出，日本面临着东日本大地震灾后重建缓慢及长期通货紧缩等“危机状况”，需要尽快重新启动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实施灵活的财政政策、大胆的金融政策及促进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等三大战略。具体地说，制定大规模补充预算方案，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实行无限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要求日本银行设定2%的通货膨胀率；推出产业振兴政策，推动民间企业对技术与就业至关重要领域进行投资。

所谓灵活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大公共投资开支。2013年1月7日，安倍内阁出台总额为13.1万亿日元的2012年度追加预算案，计划在3月底前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高达5.3万亿日元，具体包括在日本各地区的防灾、减灾，例如桥梁修复和各地学校建筑的防震加固等，同时促进民间融资，包括创设新的政府投资基金，诱导更多民间资金进入尖端科技领域。1月29日，临时内阁会议通过带有浓重“安倍色彩”的2013年度政府预算案。首先，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比上一年度增加16%，加上2012年度补充预算中的公共事业相关费用达10万亿日元；其次，与上一年度相比军费增加400亿日元，是日本时隔11年再次增加军费，

体现了安倍政权的鹰派色彩。

所谓大胆的金融政策就是树立通货膨胀预期，压低汇率调整供需缺口。也就是通过量化宽松措施抑制日元升值，提高股市价格，改善企业收益，增加设备投资和就业人员，提高收入基础上扩大消费，促使物价上升，摆脱长期的通货紧缩。在安倍政权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日本央行在2013年1月22日与政府发表有关摆脱通货紧缩和防止日元升值的共同声明，首次明确引入2%的通胀目标，同时决定自2014年起实施每月定期购入资产的“无限期”货币宽松政策。与此同时，作风传统保守的央行行长白川方明提前退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的积极推行者黑田东彦继任，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旨在实现2%的通胀目标。其一系列措施包括提前启动无限资产购买计划、延长国债期限、扩大国债规模及制定新的资产负债目标等，同时用基础货币量取代无担保隔夜拆借利率作为央行货币市场操作的主体目标，两年内将基础货币量扩大一倍，预计到2014年底达到270万亿日元。

在促进民间投资方面，安倍政权计划在能源、环境、医疗、健康等领域实施大胆的规制缓和，争取名义GDP增长率达到3%以上。在继续推进“贸易立国”的同时，实现“产业投资立国”战略模式，推动海外投资收益回流日本，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在具体措施上，采取降低企业法人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向节能及可再生能源等产业提供补贴，完善社会基础设施等政策。在贸易方面，积极推进经济合作协定（EPA），自由贸易协定（FTA），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谈判等。

尽管安倍的上述经济政策在民主党政权时期也曾加以实施，但还是有所不同。首先，民主党注重民生，发放各种生活补贴等，自民党则重视产业、企业、社会基础设施等；其次，民主党强调政治家主导决策过程甚至政治过程，自民党则恢复传统的重视官僚以及官僚主导的模式；再次，民主党的社会经济政策面面俱到，顾及各个领域和阶层，自民党则集中财政进行大规模投资。重要的是，安倍政权的经济政策在短期内产生效果，日经平均股票价格从2012年11月14日的8665元上升到2013年5月14日的14758元，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从1美元兑换79日元贬到1美元兑换100日元，[1] 各大汽车厂家纷纷上调盈利估值。另外，由于消费者对经济复兴充满希望，所以珠宝首饰等奢侈品以及服装的销售状况非常好。2013年3月日本全国商场的销售额同比呈上涨态势，244家商场销售总额为5447亿日元，同比增长3.9%，已连续3个月呈同比增长态势。因此，安倍政权刺激经济发展的积极姿态得到国民的认可，成立之初内阁支持率为62.0%，一个月后升至66.7%，四个月后进一步升至72.1%，甚至在4月中旬达到76%，创出2001年小泉内阁以来的最高水平。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银行推行的货币

1 [日]塩田潮:『復活！自民党の謎』，朝日新聞出版，2014年，93頁。

宽松政策，58%受访者“给予积极评价”，对安倍内阁的经济政策也有58%的受访者“有望期待”经济复苏。

在2013年7月参议院选举前夕，自民党利用“重振日本”、“安倍经济学”、“十年后人均收入增加150万日元”等口号大张旗鼓地宣扬上述业绩，从而取得“自民党大胜，民主党惨败”的结果。自民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从选举前的83席增加到115席，加上执政伙伴公明党的20席，结束了较长时期执政党和在野党分别占据众参两院多数议席的“扭曲国会”局面，为安倍政权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

从整个2013年来看，“安倍经济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日本股市增长了70%左右，日元汇率下跌了20%左右，通货紧缩问题有所缓解，实际经济增长约为1.8%。日本总务省2014年1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平均失业率为4%，比上一年下降0.3个百分点，失业率连续3年下降；2013年全年平均有效求人倍率为0.93，连续4年出现改善态势；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为100.1，比前一年微涨0.4%，是2008年以来日本物价首次出现上涨。[1]

二、改变国家发展方向

实际上，作为出身山口县的政治家，重现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当地政治家带领明治时代日本走向世界强国的愿景是安倍首相的最大梦想。

实际上，作为出身山口县的政治家，重现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当地政治家带领明治时代日本走向世界强国的愿景是安倍首相的最大梦想；作为世袭国会议员，其外祖父岸信介的理想保守主义是安倍首相施政的基本方针。因此，经济政策只是其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侧面，安倍首相的最大目标是推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具体包括修改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创建国防军、增强军事实力等，彻底抛弃“重经济、轻军备、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的战后日本发展模式，即所谓的“吉田路线”，成为名副其实的“普通国家”乃至军事大国。

安倍首相是积极的修宪者，在第一次执政时已经推动国会通过了为修宪做准备的《国民投票法》。2013年通常国会开幕后，安倍首相明确表示考虑修订有关宪法修改内容的宪法第96条，为今后进一步修宪“打好基础”。该条是日本宪法第9章“修订”中的唯一条款，规定修宪必须分别获得参众两院总议员数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方可由国会向国民提出修宪议案，议案必须得到国民认可。国民认可要经过专门的国民投票或者在国会选举中进行国民投票，并得到过半数赞成。在2月1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安倍首相表示有意通过修宪组建国防军。

1《日本5年来首现物价上涨》，人民网，2014年1月31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131/c35463-24270629.html，2014年2月12日登录。

2月8日，安倍出席在首相官邸召开的旨在修改宪法、解释以实现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首次专家会议。2月15日，安倍又出席自民党宪法修正推进总部会议表示要将修宪定位为“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表现出其在任期内实现修宪的强烈意愿。

另一方面，安倍首相积极推动设立研讨日本中长期战略、制定涉及外交和安保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和旨在加强对泄密公务员惩罚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早在2006年第一次执政期间，安倍就提出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范本，建立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但由于在野党普遍反对，未获国会通过。安倍第二次执政后于2013年6月内阁提出相关法案，11月7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执政党多数赞成的结果，通过了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相关法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将常设由首相（亦称内阁总理大臣）、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组成的定期“四大臣会议”，研讨日本中长期战略性问题，制定涉及外交和安保问题的基本方针，如有需要，“四人会议”还将扩大为由财务大臣、国家交通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等内阁成员参加的“九人会议”，就涉及日本国防、外交的重要事项进行审议。2013年12月4日，首相安倍晋三，副首相麻生太郎、官房长官菅义伟、外务大臣岸田文雄、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等五人在首相官邸召开首次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安倍首相主持会议，围绕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交换了意见。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确定《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的概要，该法将更加严厉地处罚泄露特定机密情报的国家公务员等相关人员。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10月17日分别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很快经内阁会议决定后将该法案提交给国会。由于该法案没有就秘密的内涵做出明确的界定，所以有评论明确指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法案》变相把“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样的权力集中在以首相为核心的少数阁僚手中，而《特定秘密保护法案》有可能保证政府控制一切信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做出“实施集体自卫权”、导致战争的决定，因而引起社会舆论、在野党的质疑。众议院强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后，朝日新闻社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该法案的赞成者占25%，反对者占50%。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与中国的矛盾，甚至不断发出刺激中国的言行，以便引起强烈反弹，从而在改变日本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取得更多国民的共鸣。正如安倍首相顾问、“安倍经济学”设计师之一本田悦朗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让我们感到严重威胁”，因而日本必须发展经济，以建设更加强大的军力来对抗中国。用安倍首相自己的话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晋三在很大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与中国的矛盾，甚至不断发出刺激中国的言行，以便引起强烈反弹，从而在改变日本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取得更多国民的共鸣。

讲，就是日本已做好了在亚洲制衡中国的准备。[1] 再次上台伊始，安倍首相便表示将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结合边境岛屿的实际情况振兴当地经济、加强管理，并强化警备”，即在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同时抗衡邻国。在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表示有关钓鱼岛问题“没有任何交涉的余地”；在视察驻扎在日本南部的自卫队时，表示存在争议的岛屿面临日益加大的威胁，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这些岛屿；对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一事表示，“中国企图用强力来改变现状的做法十分遗憾，我绝不会妥协”。

在历史问题上，早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安倍就声称将全面重新考虑“反省历史的三大谈话”，即1982年提出教科书内容不刺激邻国的“宫泽谈话”，1993年就强征日军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的“河野谈话”，以及对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道歉的“村山谈话”；认为“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这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尽管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秋季例行大祭时，安倍首相没有进行参拜，但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敬献了祭品，并公开为参拜神社的内阁成员辩护，甚至声称“我方阁僚不会向任何威胁屈服”，最终自己还是在其执政一周年之际在一片反对声音中正式参拜了靖国神社。

在安全问题上，安倍首相在2013年于东京举行的日本与东盟特别首脑会议上借钓鱼岛、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问题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年底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日本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以及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其中提出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基本理念，表示出对中国以及朝鲜的“强烈担忧”，确定修改原则上禁止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基本方针。正如《朝日新闻》社论所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强调的是强化军事手段而不是外交协调，“积极和平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宪法的解释进行修改以求达到行使集体自卫权，以打破“禁止武器出口”三原则为突破口摆脱迄今为止法律和道德上对军事扩展的束缚，因此，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路线和基本理念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安倍首相甚至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2013年年会上暗中抨击中国，呼吁“亚洲的增长红利决不能浪费在军事扩张上”。在接受国际媒体采访时，安倍将眼下的日中紧张关系比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德关系，声称密切的经济关系并不能阻止战争爆发。

实际上，安倍首相渲染“中国威胁论”显示了另外一种意图，即振兴军需产业，为日本经济恢复与增长寻找新的支撑点。2014年2月，最具政治影响力的经济界利益团体“经团联”下属“防卫生产委员会”综合分会长代理岩崎启一郎在自民党的“国防部会”相关会议上提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改善方案”。该方案认为，防卫装备不应仅限与他国共同开发，而应允许广泛出口国产装备，并要

1 转引自吴怀中：《安倍“战略外交”及其对华影响评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1期，第57页。

求在政府内部设置专门负责武器出口的部门以加强国际竞争力。[1] 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与东盟诸国在冲绳县宜野湾市内召开防卫副部长级会议，向与会各方介绍高性能的红外线传感器、处理爆炸物品的无人机器人等应对恐怖主义及灾害的防卫装备。

三、实现目标的制约因素

客观地讲，安倍政权的各项改革政策得到日本民众，特别是年青一代的支持。东京大学的木宫正史教授表示："在日本'失去的20年'中成长起来的二三十岁的群体都认为'日本已经不再是大国，必然将面临衰退的结局'"，"他们倾向于将希望寄托在高呼'强大日本'的领导人身上"。[2] 尽管如此，能否实现其目标，尚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正如安倍首相在2014年新年致辞中所说的那样，"恢复'强有力的日本'的奋斗才刚刚开始"、"这是朝着日本建设新国家迈出一大步的时刻"。[3]

首先，"安倍经济学"开始显现负面影响。从长期的趋势来看，其政策将导致财政状况恶化。根据日本财务省2014年2月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国债等日本政府债务规模达到1017.94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国民人均负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7.5万元）。受大型财政支出增加与税收减少的影响，预计到2014年3月底，日本国家债务将达1038.7万亿日元，到2015年3月底可能高达1143万亿日元。另一方面，日元贬值政策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对出口产业带来利益，但增加了进口产业的负担。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财务省2014年2月10日公布2013年日本国际收支速报值，日本去年全年经常项目盈余为3.3061万亿日元，与2012年相比减少31.5%，为1985年有可比较数据以来最低。同时也是日本经常项目盈余连续2年刷新最低纪录，仅为鼎盛时期的2007年的约七分之一。

正因如此，尽管超量化宽松和大量公共投资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成效，实现了股票价格上涨、消费扩大以及因日元汇率下跌带来的出口增加，但通胀目标远没有达到预期，处于正增长水平的经济增长率也出现递减趋势。另外，消费税率在2014年4月从5%上升到8%，将进一步打击国内市场。不少民间经济学家预测

1《日本经济团体建议政府广泛出口武器 加强竞争力》，人民网，2014年2月14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214/c35469-24357075.html，2014年3月1日登录。

2《韩媒：韩中的"共同敌人"安倍为何在日本人气不减？》，凤凰网，2014年2月13日，http://news.ifeng.com/world/special/anbei/content-2/detail_2014_02/13/33762495_0.shtml，2014年3月1日登录。

3《安倍新年致辞称要夺回强大日本 暴露军国野心》，新浪网，2014年1月2日，http://news.sina.com.cn/o/2014-01-02/080529140874.shtml，2014年2月12日登录。

2014年日本经济增幅平均值为0.8%，[1] “安倍经济学”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将“完全走进死胡同”。

其次，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与增长。日本是世界上少子化老龄化现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2013年，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达24%，同一年日本总人口减少了24.4万，连续7年呈自然减少态势，而且今后仍将持续。据权威机构推测，到2050年，日本总人口将从12700万减少到9700万，到2100年进一步减少到5000万。20—65岁的劳动人口从现在的7200万减少到4600万和2300万。[2] 老龄化不只影响生产，更影响消费和投资。因为社会老龄化将使需求降低，进而使市场萎缩，降低企业的投资欲望。企业越减少投资，失业率便越高，人们的消费欲望会更低。同时越是老龄者，储蓄率越低。随着社会的老龄化，日本的总储蓄率在1980年以后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投资。2013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其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最大原因归结为“人口骤减”，并称对不愿接纳移民的日本未来“感到极为悲观”。

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世界发展潮流中，日本本应加强与经济增长较快的两个邻国中国和韩国的经贸合作关系，带动本身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但安倍政权却背道而驰，不断恶化令中韩两国愤怒的领土问题及历史问题，严重影响到双边及多边关系。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年中日贸易额3125.5亿美元，同比下降5．1%。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下降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主要是经济因素，但不必讳言的是两国关系也对此造成了影响。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发布的中日贸易统计报告也显示，2013年中日贸易总额为3119亿9518万美元，与前一年相比减少6.5%，连续2年出现下滑。此外，2013年全年日本对华贸易赤字达522亿2863万美元，同比增加17.8%，刷新此前对华贸易赤字的记录。

再次，修改宪法、实现集体自卫权尚缺乏较强的民意基础。共同社2013年4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46.3% 的人反对修改第96条，42.7% 的人赞成。《朝日新闻》的民调也显示，52% 的人主张“不改为好”，39% 的人主张修改。共同社2014年1月进行的电话舆论调查结果显示，53.8% 的受访者反对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超过了赞成者的37.1%；共同社2月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66.8% 的受访者反对放宽原则上禁止武器和相关技术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幅超过赞成者的25.7%。

尽管如此，作为具有条件反应、歇斯底里或易走极端等特性的民族，日本很

1《2014年日本经济将大起大落 经济增长预测仅为0.8%》，人民网，2014年1月2日，http://japan.people.com.cn/n/2014/0102/c35463-24002646.html，2014年2月12日登录。

2 [日] 伊藤隆敏：「日本の中期的課題とは何か」，「東洋経済」，2014年2月22日，9頁。

容易在外来冲击下形成对抗性的社会舆论。也就是说，尽管目前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支持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舆论环境，但如果来自外部的压力增大，甚至形成虚构的危机意识，日本发生急速变化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方面，尽管美国再三声明钓鱼岛适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保卫范围，但始终主张日本对钓鱼岛只拥有行政权，时而表示保护日本不受外来的侵犯，时而声称不介入中日之间的冲突，从而使日本民众对日美同盟的坚定性产生怀疑，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担心，一旦发生危急事态，美国是否真的会保护日本。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014年2月对读者进行一项调查，在回答“中国迅速崛起的同时，是否会对日美同盟感到不安”时，50%的读者表示“会感到不安”，34%的读者表示“感到强烈不安”。另一方面，安倍首相试图控制或影响媒体，以便形成支持其政策的舆论基础，不仅自己在国会发言中明确指责《朝日新闻》的意图是颠覆政府，其安排的日本广播协会高层人物接二连三地否认侵略历史，并明确表示日本广播协会的国际报道应在中日钓鱼岛等争议问题上支持政府的政策。

尽管目前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支持日本成为军事大国的舆论环境，但如果来自外部的压力增大，甚至形成虚构的危机意识，日本发生急速变化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最后，美国对日本的制约因素。国际冷战体制结束以后，驻冲绳美军司令曾提出“瓶塞论”，即驻日美军不仅具有稳定东亚局势的作用，也起到抑制日本军事力量增长的作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出现了日美安全保障新宣言、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周边事态法等针对中国的强化相关军事同盟的趋势。客观地讲，战后美国不仅在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即使在内政方面也对日本具有较强的影响力。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逐渐放松日本在军事安全方面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日本修改宪法、发展军事实力、拥有集体自卫权，以保持东亚地区的均衡状态，但也不会让日本走得太远而失去控制，同时又对日本在历史问题、领土问题上的过度行为加以些许制约。因此，美国不仅对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罕见地表示“失望”的态度，而且严厉指责发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言论的日本广播公司高官指控美国“臆造”日本领导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罪行的行径十分荒谬，希望日本能够避免发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言论。